

九九七東亞漢學論文集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主編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一九九七東亞漢學論文集

淡江大學中文系 主編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一九九七東亞漢學論文集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初版。--臺北市：
臺灣學生；1998[民87]
面；公分

ISBN 957-15-0866-7 (精裝)

ISBN 957-15-0867-5 (平裝)

1.漢學 - 論文, 講詞等

030.7

87000891

一九九七東亞漢學論文集(全一冊)

主編者：淡江大學中文系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發行人：孫善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六八號

電話：二三六三四一五六

傳真：二三六三三三四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刷所：宏輝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話：二二二六八八五三

定價

精裝新臺幣四二〇元
平裝新臺幣三五〇元

西元一九九八年一月初版

03402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866-7 (精裝)

ISBN 957-15-0867-5 (平裝)

序

漢學研究在這個時代，有其特殊的價值與意義。暫且不論漢學本身的價值，單就東亞在世界舞台日漸重要的事實，做為東亞文化主軸的漢學，就足以具有世界級的分量與地位。尤有進者，這樣的國際發展，也引發了西方對漢學的種種討論。例如美國政治學教授杭廷頓便認為東西方必將展開在現實角力之外的文化衝突，而強調西方世界應對此趨勢之正視。杭廷頓的觀察實在非常粗糙，但是其對東方文化之注意，卻也提醒了漢學研究之重要性。

就漢學而言，東亞諸國的研究仍是重心。淡江中文系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先與日本及韓國的學術同道，舉辦中、日、韓三國的漢學會議，輪流在三國舉辦，以做為整合世界漢學的奠基工作。第一屆於一九九六年在日本鹿兒島大學舉行，第二屆於一九九七年在台灣淡江大學舉行，第三屆於一九九八年在南韓江原大學舉行。並希望以此種模式永續地舉辦下去。

東亞漢學會議的理念非常單純，不過就是聚集中、日、韓三國的漢學研究者一起研討，不對主題做任何之限定，以充分吸納不同的領域與範疇。這一方面是為了豐富彼此的視野，一方面也是為了宏觀的整合。從二屆的會議看來，論文的方向非常多元，有文學、哲學、宗教、藝術等不同之範疇，這正是我們所樂見的。學術分工乃是無可逃的必然趨勢，但是這種實然的狀態並不表示就是應然的合理。我們認為分工後的溝通與整合，將是日後學術發展的重要方向。今天，無論是從人文、環境、經濟、資訊等不同的角度反省，整合的需求都無比強烈。人文固然不必說，環保也將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更涉及人的價值觀；經濟也不只是現實的運作，經濟秩序與倫理的建立，在目前東南亞經濟風暴的肆虐下，已經被痛切地提出；至於資訊的大量產生與流通，資訊已不只是資訊問題，而更是社會、經濟等問題的總結。同理，在漢學的研究中，整合的要求也就顯而易見了。由此看來，如果說學術分工乃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宿命，那麼，隨之而來的整合也將是人類文明必經的歷程。我想，淡江大學中文系在諸多專門學術會議的舉辦外，特別重視東亞漢學會議之召開，也正是回應此整合之世界未來趨勢。

此次會議的舉辦，完全是由本系周彥文教授一手負責，我在此要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而日本及南韓方面的學者，不但勇於提出學術成果，而且樂於承辦會議之行政，其情令人敬佩。系上的黃麗卿老師、黃慧鳳助教、吳春枝助教、溫晴玲助教及大會工作

人員的辛勞，更是使此次大會成功的關鍵因素，也應得到高度的肯定與讚嘆。

最後，謹以朱子之詩文一首，與諸君子共勉之：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高柏園 序於
一九九八年一月五日
淡江大學中文系

一九九七東亞漢學論文集

目 錄

序·····	高 柏 園·····	i
大田錦城的學問·····	連 清 吉·····	1
江戶時代的歐陽脩評論·····	東 英 壽·····	21
馮友蘭論「郭象的哲學」·····	唐 亦 男·····	29
高麗、朝鮮的宋詞·····	李 京 奎·····	41
聖人旨意的探討——伊藤仁齋《論語古義》的意圖·····	金 培 懿·····	57
報應理論釋疑——以〈釋疑論〉為中心的論述·····	林 惠 勝·····	95
名家類的定義及其在目錄學上的轉變·····	周 彥 文·····	115
潘仁《唐丞相陸宣公奏議纂註》略論·····	谷口明夫·····	137
《詩經》服飾考·····	林 登 順·····	147
繫與不繫之間——析林冷〈不繫之舟〉·····	何 金 蘭·····	163
再論西崑體衰落之因緣——並說所謂「崑體工夫」·····	周 益 忠·····	169
蘇軾的藝術論與“場”·····	高 津 孝·····	181
東漢《河圖》、《雒書》與「經讖」關係之探討·····	黃 復 山·····	193
再論董仲舒思想與黃老之學·····	鄧 紅·····	215
論明朝藍芳威的《朝鮮詩選》·····	朴 現 圭·····	225
宋澤萊的小說與宗教體驗·····	林 慶 文·····	245
薩摩藩與漢語——關於漢日詞典《南山俗語考》·····	中筋健吉·····	263
莊子內篇詞語重出之組合釋例——以緊鄰現象為考察·····	王 仁 鈞·····	273

大田錦城的學問

連清吉

提 要

大田錦城自述其一家之言，說：「我之家法在漢傳唐疏、宋元註解、明清著錄、不以愛憎爲取舍、務以公平之心折中諸說、猶有不慊於心之處、精思考覈、期至當而止。」（《梧窗漫筆三篇》）無漢唐注疏或宋明義理，甚且乾嘉考證的門戶之見，務以合理精當之原則，而以「實事求是」的窮究爲究極。換句話說大田錦城的學問乃是實證主義的文獻考證學。

到了大田錦城的晚年，由於當時的考證學成爲趣味性的把玩，附庸風雅的手段。因此反省昔日未必重視宋明理學的偏差，提出儒家的學問可分爲道德（即聖人之道）與經學（即文獻考據）二途。以爲「（義理）切實人事治道之事多、……不可廢棄。」（《梧窗漫筆後編》）乃明白地指出辨明文獻真偽、精確解釋的考證和闡述聖人著述之真義的義理之學是異趣殊途的。換句話說，在當時不具實用性的考證學流行之際，作爲手段而以「實事求是」之實證主義爲究極的考據之學固然有基本性的存在必要，但是作爲學問根底以發揮聖人之道的義理之學，更有極盡發揚的必要。亦即考證學並非實學，只是追求科學性的實證性真實的基礎學問。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終身職責乃在於道德理想的實踐。這是大田錦城晚年重建道德性儒家思想結構的覺醒。就這一層意義而言，大田錦城是日本江戸期的「一代碩儒」。

一、大田錦城的生涯

大田錦城，名元貞、字公幹、號錦城。加賀（今石川縣）大聖寺人、明和二年（1765）生，文政八年（1825）沒，享年六十一。幼時有神童之稱。父名玄學、以醫爲業，詳於本草。錦城先隨兄伯恒學醫，然不屑爲方技之術，欲以儒學立身。天明四年（1784）、

遊學江戶。時年二十。

根據年譜^❶所載，大田錦城的生平大抵如下：

明和二年（1765） 一歲

生於加賀大聖寺。

八年（1771） 七歲

隨兄讀《大學》《中庸》、從父學詩文。

天明四年（1784） 二十歲

遊學江戶、入學山本北山的奚疑塾。

五年（1785） 二十一歲

於駒込開設私塾。

六年（1786） 二十二歲

寄寓於紀桂山的醫學館。

自號錦城。

秋、自北山門出、於醫學館講經書。

天明八年（1788） 二十四歲

於塾堂揭示「三義」。

寬政二年（1790） 二十六歲

制定「塾約十五則」。

三年（1791） 二十七歲

撰述《中庸考》、《論語大疏》。

七年（1795） 三十一歲

撰述《疑問錄》。

享和二年（1802） 三十八歲

《錦城百律》刊行。

文化元年（1804） 四十歲

《九經談》刊行。

七年（1810） 四十六歲

講學於吉田藩邸。

八年（1811） 四十七歲

❶ 加地伸行編《皆川淇園・大田錦城》（《日本の思想家》、明德出版社、1986年）的附錄。

仕於吉田侯、俸祿二十五人扶持。

十年（1813） 四十九歲

《梧窗漫筆》刊行。

文政元年（1819） 五十五歲

於吉田藩城的時習館講學。

十二月、至京都。

文政三年（1820） 五十六歲

訪賴山陽。

七月、返江戸。

四年（1821） 五十七歲

撰述《仁說》。

五年（1822） 五十八歲

仕於加賀藩、俸祿二百石。

六年（1824） 五十九歲

《學庸解》刊行。

七年（1825） 六十歲

寫《梧窗漫筆後編》序。

八年（1826） 六十一歲

四月二十三日沒、葬於谷中一乘寺。

元明四年（1784）、二十歲的大田錦城遊學江戸，入山本北山の奚疑塾。山本北山是折衷派學者井上金峨の門下，其後，學有專精而成一家之言。其學以孝經の研究爲中心，故將書齋命名爲〈孝經樓〉。山本北山出身於富裕之家，故輕錢財，以「儒俠」自任。但是，大田錦城以爲：

余居數日、竊疑其人狂誕自信、決非君子之人。（〈記悔雜文〉、《春草堂集》卷三）

即頗不堪山本北山之言行舉止。雖然如此，一旦寄身其門，自不能立即揮身而去，乃專心於學問之研究。同門中有山中天水、小川泰山。山中天水長錦城五歲，小川泰山小錦城五歲。據小川泰山《經子考證》の錦城序所載，三人晝論經書，夜間則研讀群書。山中天水披閱李白、杜甫、白樂天、袁中郎等集部之書，小川泰山治管子、韓非子、莊子、列子等諸子之學，錦城則攻漢唐史書及資治通鑑。

天明五年（1785）、錦城之兄北岸の《瓶花庵集》撰成，錦城爲之撰序。也請山本

北山賜序。不料山本北山却竄改錦城的原文。錦城原本就不屑山本北山的人品，再加上有此不愉快的事情，錦城乃決意退出山本北山之門。山中天水也一同離去。錦城的〈書瓶花庵集序後〉^②追記此事，說：

戊辰（天明八年）三月晦夜、貞（錦城）與淺草浜中諮詢閱家中舊書、得瓶花集序稿。是貞昔從遊山本喜六（北山）時之所作。喜六更互其起頭一章、改竄其中間數字。彼皆以朱字細書其行間。數年在書篋中、字殆漫滅、挑燈照之、乃纔得讀矣。……乃謂諮詢曰、余昔與足下從彼受役、一時遇然之失、至今噬臍不及。序中所謂命世宏博、卓絕蔚麗、撥亂反治數語、自今觀之、近似謬言。然在當時、爲彼昏迷、以謂彼之才識實然。彼才雖敏俊、概失輕躁、學雖該洽、概失駁雜、識雖卓異、概失偏僻、文雖蔚茂、概失放縱。加之說經紕繆、誣罔聖道也甚。

其激烈批判山本北山學行的態度，雖經過數年，依然不改。

天明五年（1785）、大田錦城築居於駒込吉祥寺，稱爲春草堂。翌年，即寄寓於神田佐久間町的多紀桂山的醫學館。雖然居住在駒込的時間只有一年，對駒込春草堂的詠懷却極深。如〈乙巳文稿〉中，有〈駒込雜詠〉。又天明六年的〈丙午文稿〉（《春草堂集》卷二）也有〈懷駒込舊居〉三首。或記載所住近郊的情景，或記述與寺僧飲茶玄談之樂，或描寫與花爭艷的鄰家女，或暢叙與門下論學之樂。

知遇於多紀桂山，對大田錦城的學術研究而言有甚大的影響。

多紀桂山，名元簡、字廉夫。多紀家世代爲幕府的醫官。特別是元德（藍溪）、元簡（桂山）父子和元簡的兒子元胤、元堅三代更精於醫學而知聞於世。躋壽館爲元德的父親元孝所建，寬政三年（1791）隸屬幕府，改稱爲醫學館。元德以爲傳統古醫學過於偏執，提倡折衷古今諸派醫學的折衷醫學。元簡生於寶曆五年（1755）、長大田錦城十歲。幼時即隨父學醫，又從井上金峨研究中國古典經傳之學。寬政二年受命爲侍醫，同十一年繼承父業。發揭父親的主張，注釋《傷寒論輯義》《金匱要略輯義》等書，而《醫賸》爲其代表作。又校訂出版《醫略抄》《本草和名》等書。文化十七年（1801）沒。元簡與錦城相交甚深，至其晚年，依舊不變。錦城也引爲平生知己。錦城的〈獨醉醫談序〉^③指出。

劉桂山（元簡）一代偉人也。博聞強記、驚才絕識、古今醫流、無有其比者。予與之交三十年、常預聞緒論。元簡死後、長男元胤、繼掌醫學館。元胤也精通醫

② 《春草堂集》（尊經閣叢刊、東京前田家育德財團影印、1936年、下同）卷五。

③ 《春草堂集》卷十六。

學，著《醫籍考》百卷，解題中國歷代醫書，並加以整理分類。其弟元堅任醫學館教授，撰述《傷寒論述義》《金匱要略述義》等書，又編修刊行《醫心方》《聖濟總錄》等書，頗能祖述其父元簡的遺志。

錦城至江戶的天明四年（1784）足躋壽館全盛期的時候。根據多紀元堅的《時還讀我書》，從這一年開始，正式承認非諸侯、武士子弟也能接受百日的基礎教育。躋壽館除了山田圖南、目黑道琢等人所教授的專門醫學教育外，也加上儒家經典的講授。首任教授是井上金峨、其次是吉田篁墩、龜田鵬齋，其後大田錦城也應聘授課。

多岐元簡的父親元德在明和二年（1765）、敦請井上金峨擔任躋壽館首任教授，同時教授長男元簡的儒學教育。因此，井上金峨的門人吉田篁墩、山本北山、龜田鵬齋等人也與元簡、躋壽館有親密的關係，就在此時。元簡蒐集井上金峨的詩文，而在天明四年（1784）編集刊行《金峨先生焦餘稿》七卷。大田錦城入門山本北山的奚疑塾，也正是這一年。多岐元簡與大田錦城之所以結識，即因為元簡也出入山本北山奚疑塾的緣故。錦城稱「桂山（元簡）素懷奇負氣、不妄屈人。」（多紀桂山墓表）桂山（元簡）也嘉許錦城的學識。故於天明六年、聘請大田錦城為躋壽館的教授，講授中國古典經傳之學。並擔任其子元胤、元堅的儒師。

關於多紀家的學問，在元德一代的時候，只能說是折衷古今學說，並未能進一步地從事考證的工夫。到了元簡的時候，則有詳細的考證。換而言之，元簡的醫學是兼有考證的醫學。察考元簡的《傷寒論輯義》即可明瞭其學問的所在。根據此書序文的記載，元簡反對只根據原文，而不引述後世諸家注釋之說的古醫學派的學問。乃提出「逐條歷考、旁及他書、……開發其隱奧、臨證以辨疑、期得處方精當」的主張。因此，此書引述宋元以下數十家的解釋，以為論證的根據。至於此書的體裁，乃廣搜宋元以下數十家的解釋，隨處點校眉批，標注案語考證，再加上自說而成，因此書名為《輯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書不餘力的校勘《傷寒論》文章的脫衍，更可以證明元簡於考證上所下的工夫。如〈凡例〉所說，《傷寒論》有宋校定本和金注釋本二種，又有《金匱玉函經》別本。因此，輯義《傷寒論》時，乃以宋本為底本，並參考金注釋本、《金匱玉函經》別本，再引用歷來從數家的說法，以校勘通行本而成《傷寒論輯義》。又卷首〈傷寒卒病論集〉的注釋，引用《說文解字》《史記》等經子史書，以為注釋的地方，隨處可見。因此，就《傷寒論輯義》而言，多岐元簡的學問即是博搜實證之考證學。

多紀家的藏書極為豐富。多紀元堅的《時還讀我書》記載著：「其藏書、自古今醫書至經史子集、藏蓄之而借覽生徒。」大田錦城也說「吾友劉君、字廉夫（元簡）、敏洽該博、天下無比。……生平常抱奇書之癖、異本怪冊以為甘酥。……酒後、為余開書

篋。」（《春草堂集》）大田錦城得識元簡，因此得閱多紀家珍藏典籍。不但近時出版的清儒著述，宋元珍本也借閱流覽了。錦城於二十二歲作〈宋版晉書歌贈劉桂山〉^④的長篇詩歌，不但特別歌詠多岐家珍藏的宋版《晉書》，也驚歎多岐家汗牛充棟的藏書。錦城之所以能博覽群書，特別是與其學問有極大關連的清人論著，如朱彝尊的《經義考》、毛奇齡的《西河合集》等書的研讀，乃得力於知交元簡與多岐家藏書。換句話說，大田錦城之所以有厚實的考證學的根底，乃拜元簡與多紀家之賜。亦即多紀家，特別是元簡的存在，是大田錦城學術生涯的關鍵。

文化四年（1807），皆川淇園結束其七十四歲的生涯。大田錦城雖然與皆川淇園始終未曾見面，但是錦城自年少時，即敬仰淇園的學識，因此曾幾次寫信給皆川淇園，表示其仰慕之情。如天明五年（1785）〈與皆川淇園書〉^⑤一信中，即表達雖身在窮鄉僻壤，卻渴望受教於執京師學界牛耳之皆川淇園的心意。即使大田錦城所在的大聖寺離京畿極近，「上自士君子、下逮隸氓、內自都城市井、外至閭閻草莽、家誦詩書、人耽翰墨、未曾有不志學之人也」，即熱心於學問研究，而文化水準也頗高的地方。但是「最志厚者、必西遊上國、而從學其諸先生。以故、諸先生之學、能成一家、能發一識者、其流風餘教、亦未曾不漸被敝邦也。僕亦誓年志學、竊仰諸賢之風、雖未有知其行義之詳、議論之正、然既知平安有淇園先生者。此僕之於先生、聆其聲聞、聽其名譽、然後知者也。」即凡是鄉里之人而有志於學者，皆西遊京師，師事京師的大儒。大田錦城自幼即知聞皆川淇園的名聲，極欲從遊其門下。即是，聽從京都歸來的友人論及對學界大儒的評論，更確信其對淇園的景仰。又在草鹿蓮溪家閱讀皆川淇園所著序記論說數篇，以為皆川淇園「文辭雅傑而無浮華靡麗之病、議論精穩而無激昂過矯之病」，盛贊淇園「不特文章之士、鬱乎大儒、千歲英特、一世豪雄」。此為大田錦城於二十二歲時，對皆川淇園的仰慕。

在寬政元年（1789）所作的〈報濱中周人書〉^⑥中，大田錦城敘述著：知聞濱中遊學京都，受業於淇園，再度牽起昔時的憧憬。然後贊歎淇園的文章說，「渾浩圓活、洗練縝緻、毫不露圭角、藹然有有道之風、是足以見其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矣。」又、同一年的〈報小野文恭書〉、（同上）即致與濱中周人同受業於皆川淇園〈開物學〉的小野文恭書信中也指出，皆川淇園之學「精密微妙、實當世第一人」。因此，依然熱切地希望西遊京都，從學於皆川淇園的門下。但是，重病始癒，由於健康的因素，大田錦城

④ 〈丙午文稿〉（《春草堂集》卷三）

⑤ 《春草堂集》卷三。

⑥ 《春草堂集》卷六。

並未能遂其夙願。結果失之交臂，到皆川淇園死前，大田錦城終不能親濡皆川淇園「精密微妙」的學問。

文政三年（1820）四月、大田錦城拜訪賴山陽。錦城的弟子海保漁村敘述了二人相會的情況。

與賴子成相唱酬。是時賴子成以詩古文雄視一世。遇師彷彿、相得最歡。子成為設伊丹酒四品、相與痛飲。師劇談竟日以去。當時所得詩古文、合為一卷、名曰白湯集、三河書肆刻以行世。^⑦

文政四年（1821）正月二十六日、大田錦城真除為五十人扶持，成為吉田藩的不可或缺的重臣。同年三月十六日、大田錦城至藩邸講授《論語》，由於理順辭明，頗受好評。特別世藩主信順與藩主的世子皆出席，錦城更受到重視。

文政五年（1822）七月十四日、大田錦城改仕加賀藩。關於其間的實情，藤田幽谷所撰的「錦城先生大田才佐墓表」^⑧有詳細的敘述。

加賀金龍公（前田齊廣）惜先生北藩之產、而為境外賓師。屢遣使于吉田邸請先生。吉田侯不可。乃倍其食祿、禮遇愈渥。然加賀侯之請益切、不能固拒、以命先生。先生亦以其父母之邦、起而應其聘。加賀侯授祿三百石、班上士、不煩以職事。

大田錦城雖無仕二君之意，但是，在固辭不得的情況下，只好告別寵知優渥的吉田藩而歸仕鄉里的加賀藩。

翌年，即文政六年的正月開始，大田錦城不但在加賀藩藩校授課，也擔任藩主前田齊廣的侍講，同時在江戶開設的私塾也於正月二十九日再開。從吉田藩歸返加賀藩後，或許由於心力交疲的緣故，大田錦城一病不起。於文政八年（1826）四月二十三日、結束其六十一歲的生涯。關於大田錦城的儒者生涯，其弟子海保漁村「祭大田錦城先生文」如是記載著。

惟文政八年、歲在乙酉四月二十七日、門人海保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錦城大田先生之靈。嗚呼哀哉、先生學究古今、識洞天人、其於四子六經之書。孔子孟軻之旨、闡幽發微、無復餘蘊。夫豈獨經義道學然乎、凡古書之盤錯肯綮、世

⑦ 〈漁村海保府君年譜〉（《日本儒林叢書》十四卷所收、《日本儒林叢書》乃鳳出版社、1978年出版、下同）。

⑧ 《近世名家碑文集》（東京經濟雜誌社、1983年）所收。

儒之聚訟紛紜、難讀難句者、得先生一言，刃迎而解者、不一而足也。夫黨同伐異者、學者之通弊、而古今之同情也、先生說經、於漢宋之學、無所偏黨、可者從之、不可者改焉。平生之言曰、吾於漢儒推鄭玄、而宋儒推朱子矣然而鄭玄朱子之所誤、則亦排詆糾駁、不遺餘力。世之學者黨枯竹、護朽骨、於聖人之道、無所知解。故聽先生之言，遽然驚駭、至於罵為異學、若在虛氣平心之人、則先生之學實有尸祝奉崇之不暇者焉、是先生理經之精、講道之明、而直道之在人、不可得而磨滅也。先生洽聞博見、不獨於經義有功、國家之治亂興壞之理、以至人事之失得、利害之故、明如觀火。故所著之書、上明經旨、中及人事治道、下正傳注之訛、其言明白正大、實學者之模範也。若文推歐蘇、詩宗晚唐、皆窮其奧妙矣、他及後世細瑣零碎之事、亦莫不一一究其理焉。嗚呼、如先生者、天下其有幾人歟。……先生著書等身、皆天壤間不可少者也。其既刊布者若干卷、其未脫稿藏于家者、亦數十種、行應上梓。嗚呼先生奄忽長逝、無復歸期、而其著書留天地際者、足以啓發來學、興起後人、則比於彼草亡木卒之徒、一逝而泯滅湮盡、不見稱於世者、相距幾何也。……^⑨

二、大田錦城的著述

根據上述年譜的記載，大田錦城的主要著作有：寬政三年（1791）、即二十七歲時，撰述《中庸考》和《論語大疏》。寬政七年、即三十一歲時，完成《疑問錄》。文化元年（1804）、即四十歲時，刊行《九經談》。文化十年、即五十一歲時，《梧窗漫筆》付梓。文政四年（1821）、即五十七歲時，撰述《仁說》。文政六年、即五十九歲時，刊行《學庸解》。翌年、即死前一年、撰寫《梧窗漫筆後編》的序。又根據《梧窗漫筆》卷末附錄門人荒井堯的〈錦城大田先生著述日記〉，錦城的著作尚有文集文《錦城文錄》、詩集《白湯集》和《鳳鳴集》、詩文集《春草堂集》等。其他還有不少有關經書寫本的遺稿。

就《論語大疏》的體例而言，條列《論語》的章節，然後引述漢唐古注、宋明新注、伊藤仁齋的《論語古義》和荻生徂徠的《論語徵》等注解。由於盡力網羅中國本土與本邦先賢有關《論語》的主要注釋，《論語》的諸說一目瞭然，於《論語》的研究，提供極為便利的途徑。而大田錦城為學以博引旁證為基礎的主張也可以知悉。不過，《論語大疏》只止於集釋的工夫，因此，只能說是折衷《論語》古注、新注，並權衡前賢所見，

^⑨ 《漁村先生遺稿》（手稿本、1905年印行、國會圖書館藏）所收。

而缺乏自家見解的考證特色。^⑩

《疑問錄》則指摘對宋學存疑的所在，徵引經傳子史，並參考伊藤仁齋《語孟字義》、荻生徂徠《辨名》對程朱批判的論議，作實證性的考證。

《九經談》為大田錦城的代表作，全書共十卷。有總論、及論述有關《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尚書》、《詩經》、《左氏傳》、《周易》等九經的諸說，並陳述自己的見解。關於儒家經典、特別是對五經作博引旁證且展開精密議論的研究，是江戶時代的學界所未有的。因此，此書傳誦一時，大田錦城的名聲也為當時的學術中人所熟知。門人海保漁村敘述《九經談》出刊的情形，說：「此歲、大田錦城師以所撰九經談十卷付之梨棗、學者喧傳、名盛一時」^⑪。

《梧窗漫筆》有は三編，根據各編的序文所載，正編是〈畏天錄・知命錄・畏聖錄〉合刻，於文政六年刊行的。後編是〈三錄併啓迪錄〉，於文政七年付梓的。第三編是天保十一年刊行的。關於《九經談》的內容，根據後編所附弟子戶谷惟孝的序所述，「錦城先生、往為門人小子講衰了凡陰鷲之學、則筆其意而為割記、名曰梧窗漫筆。」是知《梧窗漫筆》是旨在為門下生講述實踐性的道德。其論述中頗多引證群經諸子與歷史掌故以為論述的根據。誠足以表現大田錦城以考證為學問根底的立場。但是《梧窗漫筆》所顯示的大田錦城的思想立場却有所不同。即相對於以考證學為主的《九經談》，《梧窗漫筆》則率直地敘述其對實踐性道德。就《梧窗漫筆》的成書年代而言，此書頗能說明大田錦城的晚年主張與其心境。換句話說，大田錦城之為日本江戶時代考證學派的代表，由其撰述有詳於考證的《疑問錄》與《九經談》二書可以知悉。而大田錦城不僅是考證學者，對現實有深刻的反省，進而提出實踐道德之意義的主張，又由其《梧窗漫筆》三編的論著，可以理解其晚年則強調經世的重要。

三、《九經談》

大田錦城的代表作《九經談》刊行於文化三年（1804）。此書甫一發行，即爭相傳閱，使大田錦城一躍為學界的知名之士。雖然如此，也傳聞著《九經談》頗多剽竊清人論說的指摘。對於此一指摘，錦城如此回應。

^⑩ 參考金谷治的「日本考證學派の成立」（源了圓編《江戸後期の比較文化研究》頁381頁88、ペリカン社）。金谷治先生界定〈折衷學〉與〈考證學〉的意義說：「折衷學重漢唐的訓詁而集諸說以折衷，無考證學之以博搜為實證之證明。」

^⑪ 〈漁村海保府君年譜〉（《日本儒林叢書》十四卷所收）。

余初年著九經談、引用宋元諸儒著述、黃氏日抄、困學記聞、清朝朱彝尊、顧炎武之說、或有出其姓名、或有不出者。本九經之談話，則此體裁可也。近時雖聞余剽掠先儒說之誚、不辨知著書本意之徒、則不足憎、不足咎也。（《梧窗漫筆》三編卷下）又有以爲《九經談》的論述不過是抄錄阮元的《學海堂經解》而已。大田錦城唯恐露出破，在《學海堂經解》傳入日本時，即全數購買的傳聞。其實《學海堂經解》的刊行是在大田錦城死後。因此，大田錦城剽掠阮元的《學海堂經解》以撰述《九經談》的指摘，即不攻自破了。

與大田錦城同時的學者豬飼敬所以爲《九經談》的論述是「識見正大、援引宏博、竊謂海內無二。」而大加贊賞。《九經談》刊行時，欄外眉批處即附載著豬飼敬所的評語。

《九經談》的〈總論〉對中國經學的流行，作如次說明。

經學、古今之間有三大變焉。而小變不預也。有漢學焉、有宋學焉、有清學焉。漢學長于訓詁、宋學長于義理、清學長于考證。自漢至唐、其學小變、然要皆漢學也。自宋至明、其學小變、然要皆宋學也。清人有爲漢學者、有爲宋學者、有混漢宋之學而自爲一家者焉。然要皆清學。而其所長則考證也。此古今經學之三大變也。（《九經談》卷一）

在大田錦城之前，雖有伊藤東涯的《古今學變》分漢、唐、宋、明四個時期說明中國學術的發展。但是包含清朝考證學而通觀中國經學歷史流行的論說，大田錦城爲日本學界第一人。因此豬飼敬所推崇大田錦城有「大見識、大議論、非達古今者、不能爲此言。」（同上）

大田錦城又說：

程朱之說、浸淫乎佛老者、是其學之所短也。去其所短而取其所長、則未必不粹然也。吾嘗言、漢學小醇而小疵、宋學大醇而大疵。後有明者、或以此語爲知言矣。（同上）

持平地分析漢宋學的長短。蓋漢學之弊在偏重訓詁名物的解釋，而忽略儒學精髓所在之義理的探究。至於宋學之弊則在於引用佛教經義與黃老玄學以注釋儒家經典，故不免於雜而不純的批判。雖然如此，著重於仁義道德的發揚與世道人心的強調，則是宋學的長處。又關於陸象山、王陽明的心學，大田錦城如是論述著：

王陽明之學出于陸象山、是宋學之支流也。以六經爲故紙、全出于象山六經注我。

其實禪家頓悟之機、而達摩不立文字、見性成佛、莊周六經先王之陳跡、書古人之糟粕之意也。唯象山自忌其爲莊禪、而陽明則自言、良知即佛氏本來面目、格物致知即佛氏常惺惺。是不忌其爲佛老。（同上）

繼說明漢宋優劣之後，大田錦城也品評本邦前賢、特別是盛行一時之古義學與古文辭學的得失。其論伊藤仁齋的古義學說：

我邦唱古學者、以伊藤仁齋先生爲祖師矣。先生負英邁之資、抱卓絕之智、生於天下滔滔淪胥濂洛之中、特起麾之、海內靡然。……唯其學半出于吳廷翰吉齋漫錄。所見不博、而乏考證。故疑大學、斥中庸、卑視詩書易、而特尊論語。遂言三代聖人與孔夫子。其道不同、是背於論語述而不作、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其學多不可信者矣。（同上）

所謂仁齋之學多半「出自吳廷翰之吉齋漫錄」者，乃大田錦城以爲吳廷翰與伊藤仁齋同主張「理氣合一說」的緣故。

至於荻生徂徠的學問，大田錦城如是批評著：

繼仁齋唱古學者、爲徂徠先生。先生負雄鷺之才、養跌宕之氣。夙唱李王古文辭、主盟文壇、間然雄視一世、氣魄牢籠寰區。年五十始講經義、辨宋學、駁仁齋。其學出于楊用脩、虛驕之氣、頗相肖似。經義道學、固非其所長。欲出新奇以炫耀時目。故其說淺薄無味、其言誇誕近誣。比諸仁齋、行義識見、遠不及之。而學問之博、則稍過之。又頗知考證之學。然而其所考證、往往失當。其以安民爲仁、則至夷齊三仁之仁而窮矣。以制作爲聖、則到夫子之聖而窮矣。以明德爲君上之德、則到正考父之明德而窮矣。……矣仁齋誤駁諸經、然其所見不到異端。而徂徠則奉諸經、然其所見、則異端之魁。雖通觀其書、百中有一二可取者。不可概而廢棄也。（同上）

所謂荻生徂徠曲解經典，是說徂徠雖「博覽多通、於考證考據而奪其精神、毫髮不通天地事理」時，徂徠常「陷入邪見邪道」。¹⁹亦即大田錦城以爲荻生徂徠失於「事理」的考察，以致考證不清。

大田錦城雖然是考證學派的代表學者，未必苟同林家朱子學的主張，但是綜觀大田錦城於漢學與宋學的論述，錦城並非完全反對程朱的宋學。相反地，錦城以爲「三代以

¹⁹ 《梧窗漫筆》後編（《有朋堂文庫》、有朋堂書店、1913、下同）。